



西南大學
文獻學研究叢書

西周金文詞彙研究

楊懷源 著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楊懷源 著

西周金文詞彙研究



西南大學博士基金項目
西南大學文學院博士基金項目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序

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有眾多典籍傳世，自宋代金文研究從金石學脫離以來，又逐漸形成了漢語古文字學，不管是傳世典籍還是古文字材料，都是古代文化的載體，記載着寶貴的古代文明信息，要瞭解這些信息，首先就得從識字開始。然而，這些材料流傳自古，距今年代久遠，文字的形、音、義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就需要我們瞭解古代文字的演變情況，識得古字古音。

研究文字形、音、義的學問，傳統稱為“小學”，取“《周禮》八歲入小學，以學識字”之義。現今講字形的文字學，講字音的音韻學，講字義的訓詁學，都包括在小學之內。

懷源同志碩士階段的研究方向是訓釋漢字古義的訓詁學，以吾一日長乎彼，來從我攻讀古文字學博士學位。此後，他的研究方向更為寬泛，但仍未脫離語言學的範疇，他利用古文字材料來探索語言，注重語言理論的學習，又自修音韻學，熟練地掌握了常用漢字的上古音韻；他注重夯實基礎，關注學術前沿。現在他把他的博士論文作了進一步補充和修改，交出版社出版，書中頗有可稱道之處。

一，銅器銘文字義、詞義的考釋，論著甚多，但是從語言

學的角度系統深入地來研究的論著甚少，目前還沒有見到一部全面系統地描寫西周金文詞彙的專著，所以懷源的這本書具有開創之功。

二，漢語詞彙史的研究，西周部分是薄弱環節，學者甚少措意。研究西周詞彙，應該分為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兩大部分，懷源的這部書給西周詞彙的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三，漢語複音詞的起源問題，歷來是詞彙史研究的重點和難點，懷源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利用西周金文資料進行探討，得出了與眾不同的結論，在該問題的研究上有所突破。

四，該書附錄有詳細的相關資料，極便學者檢索、對照，省去了許多翻檢之勞。此舉不僅使讀者受益良多，也為今後的研究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同時還顯示了該書作者踏實嚴謹的學風。

總之，該書將西周金文詞彙的研究向前推進了一大步，是一部值得推薦的好書。希望能早日面世，以饗學界。

最後，再對懷源提出兩點希望。

一，西周詞彙的系統研究論著仍未面世，所以希望懷源今後在這方面繼續努力。西周的語法、音系，已有學者作過些研究，若懷源能再對西周詞彙作系統的研究，有相關成果出版，則西周的語言面貌就有了一個較為清晰的輪廓，此於學術將是一大貢獻。

二，懷源的博士學位論文中曾有專章討論西周金文的聲母系統，結論可信，現在他的專著為求體例的純一，刪去了這一章。希望今後能繼續致力於此，完成較有系統的西周金文音系的研究。

彭裕商

2007年6月於四川大學

序

楊君懷源博士學位論文《西周金文詞彙研究》即將付梓，囑我為之作序。說實話，我對古文字學雖有同嗜，畢竟是淺嘗，不及楊君術業有專攻，且得名師指点，本不該弄斧於班門。然而，既忝為師列，就義不當辭。

轉瞬又過了七年，七年前的今天，我作為答辯人坐到了“被告”席上。堂上坐的“大法官”就有彭師裕商先生。彭先生於甲金篆籀都有深入的研究，而我的論文雖祇是考證《周禮》名物詞的音義關係，卻是離開了古文字學就舉步維艱。彭師是這方面的專家，加之清癯的面龐透露出一絲絲威嚴，我在“被告”席上真有如坐鍼氈之感。出乎意料的是，彭師並沒有揪住論文的硬傷不放，相反還讚揚我能把古文字學的研究成果運用於語言研究，得出他自己久思不得其解的可靠結論，例如論文對“簠”字的考釋。這一幕就像是昨天發生的一樣。彭先生獎掖後學的長者之風令我欽佩！

來到廣西師範大學翌年（即 2001 年），從青松教授手中接過了對楊君等四位碩士生的培養指導的重擔。楊君等就成為我指導的第一批研究生。至今我仍然認為楊君是我指導的所有研究生中最篤志於學，且踏實勤奮的一個。其畢業論文《段注“廢、行字”

研究》用力巨而下的工夫深，答辯之後選送區（省）外匿名評審，八位專家一致鑒定為優，實非偶然。當時研究生找工作還不如現在喫緊，按他的家庭情形，一般人都會選擇先就業，可他毅然作出抉擇，走艱難的繼續求學之路。我極力把他引薦給彭師。在彭先生的親炙之下，楊君學日精，業日進。在古文字學領域再創佳績。

楊君著作之特色與優點，彭師已做了全面總結，不必贅述。謹談一下拜讀之後的感觸。楊君大著讓我感觸最深的是，書中有那麼一股年輕學者的蓬勃朝氣。選擇這樣的課題是有難度的，楊君知難而進，其意在於要填補西周金文研究的一個空白。誠如彭師所言：有關銅器銘文的字義、詞義考釋的論著很多，但是從語言學的角度系統深入地研究的論著甚少，尤其是全面系統地描寫西周金文詞彙的專著還難於見到，所以楊君此書具有開創之功。敢於走前人沒有走過的路，是需要有勇氣的，加之楊君此書不僅敢發前人之所未發，而且敢於正前修時彥之失。正人之失也是需要有勇氣的。當今學術界包容多於駁難，盲從勝過較真，有漢唐之風（疏不破注），而乏宋明的批判精神（盡信書不如無書）。故學術著作中剿襲雷同者眾，而自主創新者寡。楊君在書中尊重故訓又不囿於成說，採擷廣博，持論平實。在書中對前修時彥的研究成果既給予充分肯定，又指出其中的不足以及失誤。古文字學家唐蘭有言：“治學問而至不敢明是非，還成甚麼學問？學問本祇是求真理。”（《古文字學導論·序》）楊君有求真較勁的勇氣，在當今青年學者中實屬難得，而能做到平心靜氣、有理有據地辨正前哲之失，就更是不易。

作為一部對西周金文進行詞彙研究的初創之作，有這樣或那樣的不足和缺點是正常的，彭師已有指正。我本人希望楊君今後

還可將這一研究深入下去，可把殷商銅器銘文和東周銅器銘文結合起來進行歷時描寫和研究。還可拓展到簡牘帛書文字的研究上。真正弄清西周金文詞彙的前源後宿。憑楊君之銳氣和學術根基，是可以實現這一目標的。

劉興均

2007年5月30日於桂林

目 錄

序	彭裕商 (1)
序	劉興均 (1)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出土文獻的語言學價值	(1)
第二節 西周金文的語料屬性 & 語言史價值	(8)
一 西周金文概況	(8)
二 西周金文的語料屬性	(11)
三 西周金文的語言史價值	(13)
第三節 西周金文詞彙的研究價值	(16)
一 研究的必要性	(16)
二 研究的可行性	(18)
三 研究的詞彙史價值	(21)
第四節 語料擇定、理論與方法、內容編排	(23)
一 語料擇定	(23)
二 理論與方法	(24)
三 內容編排	(24)
第二章 金文詞彙研究概況與複音詞判定標準	(27)
第一節 金文詞彙研究概況	(27)

一 金文通假字的研究.....	(28)
二 金文詞彙研究	(30)
第二節 複音詞判定標準.....	(34)
第三章 西周金文的書寫形式.....	(42)
第一節 西周金文校勘舉例.....	(42)
一 概說	(42)
二 舉例	(43)
三 訛誤原因	(46)
第二節 西周金文字詞關係.....	(46)
一 同字異詞	(47)
二 同詞異字	(50)
第四章 漢字的單音節性和西周金文單音詞的特點.....	(56)
第一節 漢字的單音節性.....	(56)
一 漢字多音節論	(56)
二 多音節論難以解釋的問題.....	(62)
第二節 西周金文單音詞的特點.....	(65)
一 單音詞的多義性.....	(65)
二 書寫形式的多樣性.....	(68)
第五章 西周金文複音詞	(70)
第一節 西周金文複音詞合成詞的語法構成.....	(71)
一 雙音節詞的語法構成.....	(71)
二 三音節詞的語法構成.....	(76)
三 四音節詞的語法構成.....	(78)
第二節 西周金文複音詞合成詞的語義構成.....	(78)
一 成詞語素與詞的意義關係.....	(78)
二 雙音節成詞語素之間的語義關係.....	(81)

第三節 西周金文複音詞的來源.....	(82)
一 兩個來源	(82)
二 複音化動因	(86)
第六章 西周金文單音實詞同義詞.....	(92)
第七章 西周金文單音實詞反義詞.....	(160)
第八章 餘 論	(175)
參考文獻	(181)
附錄一 西周金文複音詞表.....	(198)
附錄二 西周金文通假字表.....	(221)
附錄三 西周金文已識字表.....	(255)
後 記	(343)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出土文獻的語言學價值

華夏文明源遠流長，在數千年的文明長河中，先賢給我們留下了大量的古籍，“人們常常用‘浩如煙海’、‘汗牛充棟’等詞語形容我國古籍數量之多”^①。有學者估計，我國古籍“總數當不少於 10 萬種”^②。這是中華民族的驕傲和自豪，而對漢學研究者來說，這更是莫大的福蔭。這些古籍依靠口耳相授、抄寫、印刷等方式輾轉流傳下來，其載體發生過變化，我們習慣上稱這類古籍為傳世文獻。從語文學到語言學的發展過程中，學者們利用這些文獻保留下來的語料，對漢語的歷史進行了多角度、多方面的深入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與傳世文獻相對，有的文獻產生後，由於種種原因或被埋於地下，或藏於洞穴，後來又被發現，重現於世，我們稱這類文獻為出土文獻。在我國歷史上，清以前大宗文獻出土有兩次：漢武

① 曹之《中國古籍版本學》，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 年 1 版，1 頁。

② 同上，4 頁。

帝末年孔子故宅古文經的發現和西晉武帝太康二年汲冢文獻的出土。這兩次文獻出土對我國學術具有深遠影響。對於發現的時代而言，這些文獻是出土文獻，而隨着時代的發展，學者們對它們不斷進行整理、研究，在今天看來，已是傳世文獻。有清以來，出土文獻數量急劇增加，甲骨、金石、簡帛均已蔚為大觀。一個多世紀以來，從研究隊伍、研究學科、研究成果來看，出土文獻研究早已超出國界，成為世界漢學界之顯學。20 世紀 20 年代，著名學者王國維先生在實踐的基礎上，作出了具有深遠意義的理論總結和創新，針對史學研究提出了“二重證據法”。隨着學術的發展，“二重證據法”的方法論意義早已突破純粹史學的疆域向多學科突進。在語言學界，綜合利用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來研究漢語史逐漸形成了共識，並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實踐。

在出土文獻研究領域，文字釋讀是基礎，學者們對此的研究非常深入與豐富。由於上古漢語裏單字與詞大致有對應關係，所以字義考釋就是詞義的探討。其研究的目的是通讀文句，以便考史和其他學科的研究。學者們很少從語言學的角度出發，把詞義放進詞義系統裏來考察，這與語文學以解釋經典為目的的性質類似，離現代意義的語言學研究還有一定距離。隨着相關研究的深入，出土文獻的語料價值得到了古文字學界的充分認可。

《中國古文字學術研究會第二屆年會紀要》指出：“古文字學與考古學、歷史學、語言學都有密切的關係……從語言的方面（語音、文法、詞彙）研究古文字材料，目前是比較薄弱的一環，會議希望今後有更多的同志從事這方面的研究工作。”^①古文字學家在研究實踐中，突破了輕視從語言學角度研究出土文獻

① 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二屆年會秘書組，《中國古文字學術研究會第二屆年會紀要》，《古文字研究》第四輯，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 1 版。

的局限，注意到了出土文獻的語言學價值，並著文從宏觀到微觀，從理論到實踐，深刻論述了出土文獻的語言史價值，進而指出目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出土文獻的語料具有真實、稀有的特點，對此，裘錫圭先生曾著文論述：“長期以來，國內古漢語研究工作者所憑藉的資料多偏重於自古流傳下來的文獻，地下發現的古文字資料多多少少有些被忽視……古文字資料顯然有比傳世古書優越的地方：一，不少古書的年代問題聚訟紛紜，因此它們所記錄的語言的時代也成了問題。地下發現的古文字資料，年代絕大部分比較明確。除去傳抄的古書以外，它們記錄的通常就是當時的語言。就拿傳抄的古書來說，由於抄寫的時代較早，年代問題也不像很多傳世古書那樣嚴重。”^①他認為，除了上述優勝外，古文字資料還有三點優於古書的地方：一，古書屢經傳抄刊刻後多已面目全非，而古文字資料很少這種問題；二，商、西周和春秋時的古書較少，古文字資料可補其不足；三，古文字資料裏往往有古書中比較少見的語言資料。他還舉例說明了古文字資料對語音、語法、構詞法和詞義研究的重要作用。

劉釗先生踵武裘氏，著《談古文字資料在古漢語研究中的重要性》^②一文，認為“對上古漢語研究來說，古文字資料是一個重要的語料庫”；在形方面，“古文字字形可以糾正以往對字形結構的錯誤分析”，“可以揭示一些字訛變和訛混的原因”，能够揭示“音化”和“義化”現象；在音方面，“古文字可以揭示形聲字的聲旁或糾正對形聲字聲旁的錯誤分析”，“可以為古韻

① 裘錫圭《談談古文字資料對古漢語研究的重要性》，《裘錫圭自選集》，鄭州：大象出版社，1994年1版。原載《中國語文》，1979年6期。

② 劉釗《談古文字資料在古漢語研究中的重要性》，《古漢語研究》，2005年3期。

分部提供證據”；在義方面，“古文字資料可以提供後世許多以往不見記載的詞義”，“可以為字典詞典記載的義項提供或提前書證”，“可以加深或修正以往對一些詞義的理解”，“可以揭示一些詞義的演化現象”，“可以探求一些詞的詞源”。

李學勤先生對出土文獻的語言史價值有深刻認識，指出可以利用古文字資料作多學科貫通的研究。他認為金文“其中不少是長篇巨製，前人以之與《尚書》相比，有很寶貴的價值”^①。李氏為本師彭裕商先生的《西周青銅器年代綜合研究》^②作序，在序中闡述了西周金文的語言史價值：“西周時期還有眾多的金文材料流傳下來，這些金文材料沒有經過後人的傳抄和整理，保持了當時的原貌……西周各階段的典章制度、重要人物、語言文字等，也都可獲得比以前更為準確的瞭解。”^③他還對古文字學與語言學等學科的關係進行了闡述：“現在的古文字學，與考古學、古代史、語言學、文獻學都有密切的聯繫。……古文字與語言學的聯繫，也是顯而易見的。中國的語言學近年來已有較大進展，語言學的一些普遍原理，特別是關於古代語言文字的研究的成果，都可以移用於古文字學。這裏應該說明的是，一般講的文字學，並不等於這裏說的古文字學，因為中國的文字學的範圍要貫通古今，因而其內涵比古文字學廣泛得多。……古文字學所研究的，限於古文字文物材料，而古文字學的成果又必然會融合到整個古代語言文字的研究中去。”^④

① 李學勤《古文字學初階》，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1版，38頁。

② 彭裕商《西周青銅器年代綜合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3年1版。

③ 李學勤《〈西周青銅器年代綜合研究〉序》，《西周青銅器年代綜合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3年1版。

④ 李學勤《古文字學初階》，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1版，4—6頁。

從方法論的角度對出土文獻研究的不同方向進行闡述的是陳煒湛先生。他說：“綜觀八十多年來甲骨文研究的歷史，不難發現，研究甲骨文，實際上存在着兩條途徑：一條是歷史考古學的途徑，它屬於歷史學的範疇；一條是語言文字學的途徑，它屬於語言學的範疇。就甲骨文字來說，研究的途徑不外乎上面兩條。所謂歷史考古學的途徑，是為研究社會歷史而研究甲骨文，是通過甲骨文所記載的‘史實’來考察當時的社會性質和各種制度，補正文獻之不足。所謂語言文字學的途徑，是重點研究甲骨文字本身的形音義，並通過甲骨文字所記錄的‘語言’來研究上古漢語。二者並駕齊驅，相輔相成，有着密切的聯繫，也存在着明顯的區別。這二者都是非常重要的，不能偏廢；而語言文字本身的研究又是研究歷史的基礎和前提。”^①他認為從語言文字的角度來研究甲骨文的成績遠遜於從歷史考古的角度來研究的成績，並認為其主要原因是：“一方面過去從事甲骨文研究者大都缺乏語言學的眼光和這方面的興趣，而從事語言學研究的學者們又大多缺乏古文字的修養，對運用古文字資料研究語言沒有足夠的重視或缺乏興趣。”^②陳氏還對利用甲骨文進行漢語史研究的價值進行了肯定，並對其中困難作了估計：“通過甲骨文研究上古漢語，把漢語史的研究工作推進一步——由西周上溯到商代。這就必須結合可靠的文獻資料，深入研究卜辭（及記事刻辭）的文法、詞彙，還要積極想辦法研究其語音。文法、詞彙、語音，最困難的要數語音。突破這一難關，單靠古文字學家不行，還要靠

① 陳煒湛《甲骨文簡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版，225-226頁。

② 同上，226頁。

音韻學家的努力，二者互相配合，方可奏效。”^①

語言學家們高度重視出土文獻，對其語言學價值作了中肯的估價，他們的論述，足以說明有關出土文獻語言研究的重要性，下面按著述年代先後作一簡略回顧。

王力先生指出：“古文字學的研究在漢語史上佔重要地位。”^②管燮初先生更是身體力行地利用出土文獻進行語言研究的大家，他曾先後推出《殷虛甲骨刻辭的語法研究》和《西周金文語法研究》^③兩部利用古文字資料進行語法研究的力作，並在《西周金文語法研究》中對出土文獻資料的語言史價值進行了論述：“西周典籍流傳下來的不多，而且古書經過一再傳鈔，舛誤難免。金文一字一句都是當時語言文字的真跡，所記載的社會情況可以證信古史，補苴史書的缺佚，是研究古代歷史的重要資料，尤其是研究上古語言史的第一手資料。”^④

日本漢語史學者太田辰夫先生也極其重視出土文獻，在其《中國語歷史文法》中，將語料分為“後時資料”、“同時資料”兩類：“所謂同時資料指的是某種資料的內容和它的外形（即文字）是同一時期產生的。甲骨、金石、木簡等，還有作者的手稿是這一類。……所謂後世資料，基本上是指資料外形的產生比內容的產生晚的那些東西，即經過轉寫轉刊的資料。……中國的資料幾乎都是後時資料，它們特別成為語言研究的障礙。根據常識來說，應該是以同時資料為基本資料，以後時資料為旁

① 陳煒湛《甲骨文簡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版，230頁。

② 王力《漢語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新1版，12頁。

③ 管燮初《殷虛甲骨刻辭的語法研究》，北京：中國科學院出版社，1953年1版；《西周金文語法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年1版。

④ 管燮初《西周金文語法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年1版，1頁。

證，但沒有同時資料的時代就祇有根據例子的多寡和其前後時代的狀況如何來推測，這樣還得不出明確的結論。”^①

向熹先生著《簡明漢語史》，在“漢字和漢語發展史”一節中指出了金文對語言研究的重要性^②。趙振鐸先生在《論先秦兩漢漢語》中指出：“殷商文獻現在能够看到的有甲骨卜辭和少數鐘鼎文字，但是材料有限，從僅有的這些材料可以看出，它已經有了豐富的詞彙和語法規則。”^③

西周金文材料有限，但反映的語言現象是豐富的。對此，許威漢先生也有論述：“西周金文詞彙與殷代甲骨文詞彙相比較，另一個令人注目的變化是新增加了若干複音詞。……瞭解古詞彙，西周金文辭不容忽略。”^④

何九盈先生聯繫語言學的相關部門來說明古文字學的重要性，說：“清代訓詁學高峰的出現是以古音學的大發展作為前提的，古音學的發展推動了古義學的發展，現代訓詁學的發展更需要以音韻學、古文字學發展作為前提。”^⑤

法國語言學家沙加爾先生 1999 年發表《上古漢語詞根》，對銅器銘文的語言史價值作了深刻論述：“同古代典籍相比，銘文內容少，文體程式化，但數量隨着地下器物發掘的進展在持續增加。比傳世典籍優勝的是，銘文未經更動，保留着書面語和漢字

① (日) 太田辰夫著，蔣紹愚、徐昌華譯《中國語歷史文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 年 1 版，374—375 頁。

② 向熹《簡明漢語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年 1 版，33—34 頁。

③ 趙振鐸《論先秦兩漢漢語》，《古漢語研究》，1994 年 3 期。

④ 許威漢《二十世紀的漢語詞彙學》，太原：書海出版社，2003 年 1 版，118 頁。

⑤ 何九盈《二十世紀的漢語訓詁學》，《二十世紀的中國語言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 1 版。